



中国出版产业发展研究丛书（第一辑）

总主编 蔡翔

媒介融合趋势下的 出版变迁与转型

The Transformation of Publishing in
Contemporary Media Convergence Trends

汪曙华 著

中国传媒大学 出版社



中国出版产业发展研究丛书（第一辑）

总主编 蔡翔

媒介融合趋势下的 出版变迁与转型

The Transformation of Publishing in
Contemporary Media Convergence Trends

汪曙华 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媒介融合趋势下的出版变迁与转型/汪曙华著.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6.12

(中国出版产业发展研究丛书/蔡翔总主编)

ISBN 978-7-5657-1846-5

I. ①媒… II. ①汪… III. ①出版业-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G23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38541号

媒介融合趋势下的出版变迁与转型

MEIJIE RONGHE QUSHI XIANG CHUBAN BIANQIAN YU ZHUANXING

著 者 汪曙华

责任编辑 赵丽华 唐 颖

封面制作 泰博瑞国际文化传媒

责任印制 曹 辉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1号 邮编:100024

电 话 86-10-65450528 65450532 传真: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uc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艺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161千字

版 次 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7-1846-5/G·1846 定 价 4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序:改革是出版发展的唯一路径

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 蔡翔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近期发布了最新的产业分析报告。从“十二五”期间的产业数据看,我国出版业呈现出良性发展态势,且不乏亮点和拓展空间,再次增强了我们的士气和信心。“十二五”期间,图书出版营业收入大幅增长且年年增长,2015年达到822.6亿元,5年增幅达261亿元,增长了46.4%。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的融合发展势头强劲,作为新业态的数字出版五年增长了318.7%,且每年增速超过30%,已成为增长最快的板块。出版业整体资本实力显著增强,据世界银行发布的资料,我国出版业投融资能力已稳居世界第一位,在跨国兼并中,中国已经成为第一大主力阵营。从以上这些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在中国的文化产业建设中,出版产业堪称中流砥柱。出版产业做不好,文化产业成为支柱产业就有可能成为空话;只有出版做强做大,文化才能真正强大起来。

我们亲历并紧密关注出版业发展,是出于产业思考,更是出于文化情怀。出版作为内容产业和文化事业,是人类知识积累和文化遗产的重要力量,寄托了一代又一代文化人的理想和情怀。出版传承文化的本质不会随着时代更迭和技术变革而发生变化,其本质与产业化运营并不相悖,产业是出版的载体,产业化运营是出版更好发挥社会功用的引擎,这已经被

过去十几年我们出版业翻天覆地的变化所验证,也是身处其间的我们真切感受到的。

2002年,党的十六大正式提出发展文化产业,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把文化产业发展成国民经济支柱型产业。我们的出版管理部门敏锐地捕捉到改革对于推动文化产业成为支柱产业的重大意义。以柳斌杰署长为代表的一代改革派,在其后的十年间,和支持者、同行者们一起,坚定地拉开了改革的序幕,推动了中国出版市场化的进程,有力地提升了文化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影响力、活跃度和话语权。

如今回首,从时间进程上看,这十年的中国出版体制改革具有渐进性特点,并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2003年,国家开展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出版体制改革拉开帷幕。2005年,随着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出台,出版体制改革工作全面展开,并按照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循序渐进、逐步推开的原则,在出版全行业不断深化。改革不仅有路线图,更有时间表,始终有条不紊,稳扎稳打,取得一系列突破性成果。例如,国有经营性出版单位相继有序实现转企改制;又如,出版行业突破障碍开展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并购重组,经此催生的大型出版集团和企业开始尝试上市融资,运用资本的力量不断提升市场地位……2009年,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出台,增强了改革的攻坚力度,使改革总体上保持着积极稳妥、有效有序的态势。行至2011年“十二五”开局之时,全国581家图书出版单位除四家公益性出版社和部队出版单位外,地方、高校和各部委出版社基本完成转企改制任务,正式成为市场主体,走出与市场接轨的关键一步。到2012年十八大召开之际,原定十八大前完成的改革目标基本如期完成。

2002年至2012年间的改革成果丰硕,为中国出版业开拓了全新的局面。首先,改制帮助出版企业确立了市场主体地位,经营活力得以激发,出版生产力得到释放,全行业发展动力强劲,产业规模不断扩大。统

计表明,2012年新闻出版业总产出达1.6万亿元,而作为改革试点起始年的2003年这一数据仅为3000亿元,改革十年,产值提高了5.33倍。其次,改制推动了出版业的市场化进程,市场逐步成为配置出版资源的主要手段,出版业跨区域、跨媒体的资源整合不断深化,战略性重组所培育的大型出版传媒集团产业地位突出,竞争力越来越强。2011年年底,全国已组建出版集团33家,其中不乏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这样的百亿级产业航母。再次,改制使中国出版业探索资本化运营的勇气和信心不断增强,驾驭资本力量的手法也越来越娴熟。这一过程中,资本无孔不入地渗透到出版业各个角落,提升着中国出版业的活力。无论是上市融资,还是战略重组,资本越来越成为中国出版业得心应手的武器。而最后,最能激发中国出版人激情的是,改制使中国出版业开始放眼世界,坚定地迈步“走出去”。国际化是中国出版业未来发展战略的重要一环,是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方向,事实上,这也是改革后产业强大带来的必然结果。

2012年是出版体制改革的一个分水岭。虽然中央确定的十八大前的改革任务至2012年年底业已完成,但改革并没有就此停步。党的十八大报告就文化领域发展提出了“促进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的新要求,中国出版业要实现这种优化升级,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解放出版生产力。2002年至2012年仅走完改革的第一阶段,为我们出版业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最大程度扫清了“拦路石”,但束缚出版生产力的因素依然存在。改革进入“深水区”,需要出版人以更大的信念、勇气和魄力破解深层次矛盾与问题。其时,我们抱以最大热情的出版业伴随改革进程也出现了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引发不少争议甚至非议,需要我们正本清源、继续前行。

所有的矛盾、问题、争议、非议,归结起来在这几个方面。其一,产业发展初期重规模轻质量的做法给我们出版行业带来很多泡沫,如在我相对熟悉的学术出版领域,推出了不少平庸之作乃至垃圾作品,引发整个学

术共同体的不安。必须解决发展是追求规模还是追求质量的矛盾,质量优先的发展方式才是可持续的。其二,出版产业的市场竞争力还不够强。由于体制机制等各方面的限制,目前很多出版企业产权改革仍不到位,还没有真正成为市场主体。其三,我们的法律制度环境还不够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健康繁荣的大市场体系还没有完全建成,致使产业资源配置难以进一步优化,出版业资本运营遭遇瓶颈。而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中国出版在当今世界出版格局中仍“大而不强”,我们现在的作品还不能进入具有世界影响力作品的行列,还不能用触及人类文明根本的话题引发世界的共鸣。在看到出版业天翻地覆的变化时,冷静审视这些客观存在的问题,继续拓展前行之路,是我们出版人的使命和义务。我们都有一個共识:改革是发展的根本动力,只有坚持改革,才能有发展;改革难免遇到问题和挑战,也正是改革让各种矛盾和问题愈加凸显,问题的背后往往潜藏着深刻的制度根源,而改革遭遇的问题恰恰只能通过深化改革、继续发展来解决。

改革是一代出版人的事业,只有置身于改革历程中的人,才能体味它所带来的诸般况味,有荣耀有光环,也有误解和遗憾。达成通过改革谋发展共识的“我们”,是这十几年出版改革的亲历者,包括新闻出版总署、各出版传媒集团以及出版研究机构有远见的领导们,他们曾是出版改革的推动者,同时,也是深入思索出版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专家和学者。“我们”也有着中坚一代的成员,积极参与了出版改革的进程,并且正在后改革时代,主持和推动着出版产业的优化升级。“我们”还有出版学界培养的大量年富力强、充满创造力的年轻学人。

出版就是这样一个产、学、研息息相关的行业,理论积极指导着行业实践,行业变迁不断修正着我们的理论,形成了有机、良性互动的生态。作为柳斌杰先生的弟子,我很荣幸在先生指引下,主持了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的转企改制,并创立了中国传媒大学编辑出版研究中心,比较全面地

参与到2002年至今的出版改革进程中。前者的市场化进程开启于2002年,后者则创立于2004年,十数年来,两者从不同角度见证了中国出版业的凤凰涅槃,自身也因侧身其间得以不断成长和壮大。某种程度上讲,我们的编辑出版研究中心,地处首都、背靠传媒,有效整合了政府、学界和业界的优势资源,已经成为中国出版人才培养和决策参考的一块高地。我们的导师团队,汇聚了近三十位充满改革意识和创新思维的新闻出版界元老、出版传媒集团新锐领导以及出版管理机构、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他们和中心的硕士、博士、博士后一起,形成了学界、业界有效联动的学术和产业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一直以客观辩证的眼光,对中国出版改革进行着系统总结、剖析与反思。

这套出版产业发展研究丛书是中心的阶段性成果,被推荐列为2015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原中国出版集团总裁,现任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先生在推荐语中称:当下的中国出版业机遇和危机共存,要实现从出版大国到出版强国的转变,需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出版产业发展路径。“中国出版产业发展研究”项目直面深化出版体制改革、出版产业政策调整、当代出版文化等重大前沿问题,多视角、全方位地为中国出版产业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智力支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价值。原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现任中国编辑学会会长郝振省先生也对丛书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认为丛书内容系统、全面,涵盖了出版产业政策、产业转型、投融资、技术创新、国际传播、数字出版、媒介融合、文化自觉、大学出版等热点问题,是一套具有完整意义的出版产业观察丛书;同时,丛书并不止于产业研究,更从文化的角度诠释了中国出版业对人类、对中国、对世界的意义。作为主编,我很欣慰地看到丛书的正式推出,也很感谢两位前辈的支持和推荐。我们中心将陆续推出丛书的第二辑,第三辑……不断跟进、记录并反思中国出版改革以及优化升级的进程,并以更为客观的视角和理性的积淀为此进程源源不断地贡献力量。目前第一辑的

作者大多还是中心的博士或博士后,他们都很年轻,普遍缺乏行业的历练,看问题的辩证性还有所欠缺。但他们的优点也很明显,没有桎梏、思维活跃、有跨学科背景、有国际化视野,是我们出版和文化产业研究的新鲜力量。丛书中《当前出版企业转型问题研究》《出版传媒上市公司投融资研究》《中国出版产业政策研究:社会转型与价值观建构》《中国数字出版产业政策研究》等都是对中国出版体制改革的客观观察,其中不乏尖锐的批评;《媒介融合趋势下的出版变迁与转型》《自出版管理问题研究》《中国数字出版内容国际传播研究》《中文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评价体系研究》等都能在相对开阔、与国际出版市场和评价体系对接的语境中谈论中国问题;《论出版的文化自觉》《大学精神与大学出版:民国时期“学人办刊”研究》则史论结合,从出版本质、出版价值这些更为根本的视角,以史为鉴,对中国出版产业发展的走向提出一己之见。

我很珍视从书体现出的朝气和活力,我们的出版产业也正需要以这种朝气和活力不断推陈出新,打好深化出版体制改革、融合发展、内容创新的攻坚战;按照十三五的规划,建成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文化公共服务体系、文化产业发展体系等“六大”体系。在此过程中,值得关注和深入分析的问题还很多,包括公共服务体系如何建构、融合发展如何真正落实、学术出版机制如何调整、社会化出版现象如何看待、出版传媒法制建设如何推进、资本市场如何突破体制壁垒,等等,“中国出版产业发展研究”丛书后续将陆续推出同人的思考。我期待丛书真正成为一个开放性平台,聚合起更多同行者的力量,为出版行业、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理论和思想动力。我们的出版产业改革一直“在路上”,我们的研究和行业观察也会一直“在路上”。

自序

时光荏苒,如白驹过隙。2011年,在一所南方师范类高校当了数年的编辑出版学教师后,我的心目中充满了深造的愿望,毅然来到中国传媒大学读博。那年我已虚年38岁,而周围不少博士生同学,比我年轻一轮还有余。三年的读博生涯,我也算努力,尽管也有慵懒的时候,但还是做了很多工作,成绩还不错,算是比较圆满。毕业之际,和其他更年轻的博士生一起,再次体验了找工作的过程,并且还能在十分激烈的较量中获得若干著名高校的教席,都应是前景光明的宽阔大道。然而,面对逐渐老去病患缠身的父母和盼我回归的妻儿,我还是回到了他们的身边,尽管事业之途看似只是一条小径。如果没有父母和妻子在后方的支持,我又怎能扶梯而上攀登到现在的高度呢?如果我人生的光荣与梦想篇章还会展开,那应该和他们一起谱写。

每一个人的成长与进步,都少不了人生的导师。在我的心目中,我的博士生导师蔡翔教授,不仅仅是我博士学业上的导师,无疑也是影响我未来行程的最重要的人生导师。蔡老师率直、真诚,在我们面对复杂局面手足无措之时,他总是能够充满力量睿智地引领大家。他在面对难题时的敏锐、快速抉择的气魄和给出完美解决方案的能力总是令人吃惊与敬佩。蔡老师对于他的学生的爱护与帮助,也总是出自内心和尽力的。有导

师如蔡老师,我是很幸运的,不仅需要感谢,更需要感恩和祝福。

其实还有一位导师,尽管不是我的学业导师,但对我的帮助,他也是悉心的。我刚开始博士学业不久,就听说李频教授要调到中国传媒大学编辑出版研究中心,这令我惊喜。李频老师对于学术研究的那份真诚,足以感染我们每一个人。他对于学科发展的推动是无私的,他让我看到了学者应有的情怀,也使我对投身编辑出版学这个艰难成长的学科有了一些勇气和信心。每一次我在困惑中寻找李老师解惑时,他总是能够极为耐心地条分缕析,以他作为杰出学者的严谨和智慧帮我找到问题的关键。无论是在我博士论文的写作,还是在工作与前途的问题上,李老师总是乐于给予我指引和勉励。感谢李老师给予我,给予我们所有的编辑出版博硕士成长的关怀,这种关怀,在某种程度是超越个人的,也关乎于学术、学科、文化。

感谢是很难的,很多情况下只能是一种心意。我也难忘刚开始读博士时柳斌杰署长、郝振省院长等师长的鼓励,难忘在博士开题、中期答辩过程中,袁军教授、聂震宁教授、刘昶教授、段鹏教授等诸位师长给予的诸多指点。编辑出版研究中心的刘大年师兄、张雨晗学姐,在我们的学习过程中做了具体细致的支持工作,他们很勤奋、很辛苦,也很有成绩。而我的博士论文写作由于种种原因,困难重重,谷征等学长分享了他们的重要经验,赵树旺同学也提供了难得的具体帮助。还有周围一起为学业和前程艰难求索奋斗的同学,也感谢和祝福他们。

2014年春夏之交,尽管时有雾霾遍布京城,但草叶快速生长飘散于空中的春夏特有的芬芳气息,仍然令人对广院和京城充满流连。今天我已回到遥远的南方,面向未来的人生岁月,我心中充满着师长们给予的勇气、智慧与希望。

汪曙华

2016年5月

目 录 Contents

自 序 / 1

绪 论 / 1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研究思路 / 1

第二节 国内外文献综述 / 5

第三节 研究方案设计与研究意义 / 14

第 1 章 媒介融合的内涵 / 22

第一节 媒介融合概念的源起与各方界定 / 22

第二节 媒介融合的核心内容 / 29

第三节 媒介融合趋势中传媒业的发展前景 / 37

本章小结 / 38

第 2 章 媒介融合中传统出版业面临的挑战与困境 / 40

第一节 数字新媒体与印刷媒介的传播特性与效率比较 / 40

第二节 新媒体条件下文化内容的生产方式变化 / 50

第三节 媒介融合时代受众的信息获取与阅读方式的变迁 / 59

第四节 媒介融合趋势下传统出版业的发展困境 / 71

本章小结 / 90

第3章 媒介融合中出版业的变迁历程 / 91

第一节 传统出版工作环节及出版媒介的数字化 / 91

第二节 欧美传媒产业组织融合的总体历程与规律 / 99

第三节 媒介融合中欧美出版传媒企业的整合与转型 / 115

第四节 媒介融合中我国出版业的集团化发展 / 139

本章小结 / 154

第4章 媒介融合趋势下我国出版业的转型发展 / 156

第一节 在媒介融合视角下重新认识出版的本质与价值 / 156

第二节 政府应给出版转型发展提供市场空间与制度环境 / 161

第三节 出版企业应通过有效的转型战略实现新的发展 / 167

本章小结 / 175

结 论 / 177

参考文献 / 180

绪论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研究思路

一般认为,人类传播迄今已经历了语言传播时代、文字传播时代、印刷传播时代和电子传播时代,目前已进入数字传播时代。在这一进程中,人类社会的信息传播能力越来越强,传播方式本身也不断地发生着变革,技术创新是传播方式和传播媒介变革的第一推动力。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获得了飞速发展,计算机、互联网等技术已越来越深入地应用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使得人类社会步入信息时代。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传媒业深受网络等数字新媒介的影响与冲击。对传媒业影响更大的是传播数字化推动的当代媒介融合大潮,如何顺应媒介融合趋势,找到在传媒业急剧变革的时代的生存空间,则是包括出版业在内所有传统传媒业门类都必须思考的问题。现今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这一概念从不同角度有着不同的理解。目前学术界公认最早提出传媒领域“融合”概念和提法的是美国学者I.浦尔(Ithiel de Sola Pool)。他认为“数码电子科技的发展是导致历来泾渭分明的传播形态融合的原因。其本意是指各

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所谓多功能一体化,目前在互联网这一数字化新媒介上体现得非常明显,互联网具有了集旧有媒介传播功能于大成的特点。而美国学者安德鲁·纳齐森(Andrew Nachison)将媒介融合界定为“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之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显然,两位学者用“媒介融合”一词描述的是不同层面的现象,前者意指传播介质层面的功能整合,而后者意指产业层面的媒体组织整合,事实上,他们代表了两种对于媒介融合的典型认识。也有学者总结认为媒介融合应具有微观、中观、宏观等不同层面的表现,涵盖传媒技术融合、业务融合、市场融合、组织融合与产业融合等多层次含义。

本研究以媒介功能进化层面上的媒介融合为讨论的逻辑起点。当代以互联网为中心媒介的媒介融合,在根本上是数字技术驱动的。数字信息系统能够加工和传播多媒体信息,文字、图像、音视频等一切形式的内容形态数字化后都能在互联网上有效表达、存储、传播与呈现。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化新传媒与传统媒介相比,在传播功能和传播效率上有质的飞跃,是更加完善的信息传播载体,同时也给人类社会传播观念甚至社会系统运转都带来深刻影响。现代传媒一方面是人类社会系统中“神经系统”,对人类社会有序运转与进化有重要意义,同时,传媒业也是经济系统中的重要产业门类。数字化互联网的形成能促进人类社会“神经系统”的改造和功能升级,必然对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有深刻影响,而传媒产业也必然因之重新整合。从某种意义上讲,互联网具有颠覆性能量。

本研究中的“媒介融合趋势”第一个层面意指互联网等数字化新媒介所带来的传播整合化趋势。在这一层面,我们看到,过去印刷媒体、电视等载体传播的内容,现在可以在互联网络上更高效地传播,这些传统媒体过去垄断的领域有了替代途径,其地位受到了威胁。具体到出版传播领域,当互联网成为媒介融合的中心时,传统出版业的“势力范围”正被

网络媒体蚕食。对此需要进一步思考:(1)当以往依赖出版途径传播的内容,转移到互联网上传播时,这种传播活动是出版吗?在新媒介条件下,出版的本质又是什么?出版活动的边界如何确定?(2)过去通过印刷出版的各类内容,哪些内容目前已可在互联网上高效低成本获取,若出版将无利可图,哪些内容还有出版价值?(3)互联网时代的受众获取内容信息的行为和条件有何改变?他们接触与使用出版物的外部环境条件变化了吗?总体来说,本论题首先思考的是,媒介融合趋势下,出版为什么需要转型?媒介融合条件下出版活动的市场空间和方位在哪里?还有多大?

其次,在传媒组织发展层面,围绕互联网开展新媒体业务的网络媒体已快速发展,对传统媒体构成了威胁。相应地,传统媒体组织也并非固守原有运转模式,而是都采取了措施发展自身,也纷纷谋求“上网”,进而发生了数字技术条件下传媒生产与运营层面的媒介融合。在产业组织形态上,媒介融合趋势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传媒相关企业和机构间的兼并、联合和重组,媒体组织间的融合可使得融合后规模更大的媒体组织拥有跨媒介的更强、更综合的传播能力和竞争优势。当然与媒介组织有关的产业组织的融合,未必都是围绕数字化媒介的产业开发产生的。本研究关心的第二层面的问题即:围绕传播新业态而发生的传媒业务和产业组织融合的进程。具体到出版业而言,20世纪80~90年代间,以我国为例,出版机构逐步完成印刷出版物生产流程的数字化改造。进入21世纪后,数字出版新业态逐渐形成,主要传播载体是互联网。但数字出版运营较成功的基本为新兴互联网内容服务提供商(ICP),传统出版社虽实施数字出版转型,但进展非常缓慢。出版企业参与的组织融合,在我国主要是近年来政府推动的集团化,但并非围绕数字出版业态转型展开。而在西方如美国,围绕数字出版展开组织并购与融合的趋势则较为明显。在这一层面,需要着重思考如下问题:(1)出版企业以何种方式顺应媒介融合趋势

实现转型发展。(2)在媒介融合趋势中,国内外出版企业参与媒介融合的情况与效益。

再次,媒介融合还表现为传媒相关产业间的交叉、渗透和重组。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数字化、网络化的深刻影响,以往各行其道的不同传媒领域、计算机业乃至电信业等领域的业务和产品不可避免地发生交叉和渗透,促使这些领域合作构建交叉平台、开发交叉产品,以延伸产业链和寻求收益共享。这不仅使得技术资源、信息资源、传播资源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得到合理配置,也给这些行业领域开拓了新的发展空间。产业层面的媒介融合给传媒业带来了深刻变革。在当今的历史方位回顾,我们一方面看到的是媒介融合进程中传媒业实际已经客观发生的“变迁”,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传媒业为应对媒介融合而主动采取的策略性“转型”,这两方面往往并不一致。对于这一过程,有如下问题需要思考:(1)媒介融合趋势下,出版业变迁的历史进程与趋势有无规律可循?(2)出版业转型有哪些影响与制约因素?我国传统出版业实施数字出版转型为何极为迟缓?也就是说,论题进一步探讨的是,面对媒介融合,出版业变迁有何规律性趋势?出版业转型有哪些影响与制约因素?

最后,本论题在前述分析的基础上,试图针对我国出版业转型的方向、路径与策略提出构想。这种策略性探讨应该具有充分的学理依据,是前文逻辑分析的自然结果。所提策略应是多角度多层面的,如宏观涉及政府和产业政策,中观涉及行业,微观涉及出版企业。总体思路应是,出版业应在媒介融合中,找准自身的方位与空间,实施技术平台升级、产业组织重组、企业制度转换,构建全媒体化产业链,开发新形态的出版物;政府产业政策与规制应该顺应媒介融合条件下的传媒产业发展规律,对出版产业政策做深度调整,为出版业转型创造好的政策条件。